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名稱：漢書論贊研究—附歷代名家評漢書輯要（I）

計畫編號：NSC89-2411-H-002-057

執行期限：89年8月1日至90年7月31日

主持人：李偉泰 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中文摘要

班固將客觀的歷史事實和個人主觀的評論區分開來，前者即歷史的本文，後者即「論贊」部分。這種作法如果達到理想的地步，則客觀的歷史事實和主觀的價值評論將涇渭分明，不相混淆。當然事實上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歷史著作無論怎樣求其客觀，都不可能避免染上時代和歷史家的色彩。但是比較而言，班固已經很努力的將價值評論和歷史陳述加以區分。相對於近幾十年來，充滿意識型態的色彩，目的明顯在於為現實政治服務的歷史著作，確實大異其趣，也是值得大力加以表彰的。班固的史觀和思想，相當集中的表現於《漢書》各篇的論贊，部分則寄寓於敘事中。本研究即以這些論贊作為探究的對象，藉以呈現班固的思想內涵，以及《漢書》作為一部史書的優點和缺點。

關鍵詞：1. 漢書 2. 論贊 3. 班固

Abstract

Ban Ku tried to separate facts from comments, and combined both of them as the most important contents of history in *Hanshu*. It is a tough work to make difference between objective description and subjective comments, because the author of history is always under the constraint that every historian has his own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cluding specific time, space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Compared with the current political objective-oriented publications of history, Ban Ku and *Hanshu* should be highly

recommended to historians.

Ban Ku's Historical ideas and thoughts can be intensively studied through his comments in *hanshu*. This project will focus on Ban Ku's comments on history and others' discussion about them, to find out the gap between facts and comments as a criteria to evaluate *Hanshu*.

Keywords : 1. *Hanshu* 2. Comments on history 3. Ban Ku

二、緣由與目的

近幾十年來，中國大陸學界對《史記》的研究極為蓬勃，在二十五史中，可說一枝獨秀。歷來與之並稱的《漢書》，則顯得相當冷清。然而歷代學界對《漢書》的重視和研究，卻遠在《史記》之上（見周洪才〈歷代漢書研究述略〉，《齊魯月刊》，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推究大陸學術界熱衷研究《史記》，相對忽略《漢書》的緣故，主要是因為中共將司馬遷和《史記》評定為具有人民性，而班固和《漢書》則歸屬於封建統治階級這一方。六〇年代冉昭德指出《漢書》「是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實不失為斷代史的典範」，認為班固著史有創造性，歷史觀點也有其進步方面（見所著〈班固與漢書〉，刊於《歷史教學》一九六二年第四期；〈班固的首創精神和進步思想〉，收入《西北大學二十屆校慶學術論文集》。）。這本來是很務實的評價，不料竟引來多人的圍剿，其中一

項問題竟是：「請問冉先生，你在研究《漢書》時，只是「客觀」的研究呢，還是考慮到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呢？」（見牛致功〈是批判的繼承，還是全盤肯定？〉，刊於《文史哲》一九六六年第二期。）在這種政治氣氛下，大陸多數學者當然寧可捨《漢書》而就《史記》了。其他地區則由於《漢書》的文學性略遜於《史記》，文字較《史記》艱深，篇幅較《史記》大，研究的風氣也遠不如《史記》熱烈。所以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彌補海內外近幾十年來這種重《史記》輕《漢書》的偏差。

本研究的另一個主要目的，是要彰顯《漢書》將價值評論和歷史事實區分開來的作法。《漢書》的論贊，屬於價值評論；其他部分，屬於歷史事實的陳述。雖然班固和司馬遷一樣，偶而不免有「寓論斷於敘事」的時候（參看顧炎武《日知錄二六·史記于敘事中寓論斷》）；而且歷史著作無論怎樣求其客觀，都不可能避免染上時代和歷史家的色彩，但是比較而言，班固已經很努力的將價值評論和歷史陳述加以區分。這種作法，相對於近幾十年來，充滿意識型態的色彩，目的明顯在於為現實政治服務的歷史著作，確實大異其趣，也是值得大力加以表彰的。

三、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分兩年進行，第一年所獲結論，就細部而言，自非本篇報告所能容納。就宏觀而言，約有下列數端：

1. 《漢書》論贊由三個部分組成：①全書卷末〈敘傳〉後半為全書各篇所寫的序文，仍稱之為〈敘傳〉。②篇前議論，稱之為「序」。③篇末評論，稱之為「贊」。這三個部分具有互補的性質，必須互相參照。例如〈郊祀志序〉泛論祭祀的來歷及各種祀典，贊語的重點則在說明漢朝的立國理論經過三度變化：由自居水德，轉變為土德，再變為火德。結尾肯定谷永反對君主淫祀鬼神，指明長生為妄想的議論。

2. 班固的批判手法不一。例如〈循吏傳序〉對於武帝的吏治作了極為嚴厲的批評：「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同時明白指出武帝的揮霍和連年用兵造成昭帝初年的嚴峻困境：「孝昭幼沖，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表面上看，這是「直接」的批判；仔細探究，這些批評不列入〈武帝紀贊〉，而置於〈循吏傳序〉中，位置懸隔，仍應算是一種「間接」的手法。〈武帝紀贊〉大力表彰武帝的文治，完全不提他的主要事功，也就是拓展疆域的武略，這是藉「不提」以寓批評的手法。對於武帝時所封的武功爵，司馬遷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中，表面上肯定武帝對外征伐，其實是張皇其詞，外表上贊揚，實際上譏諷。班固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序〉中，則僅以三句話來概括武帝時的武功爵：「武興胡、越之伐，將帥受爵，應本約矣。」這是藉「淡化」以寓批判的手法。此外尚有極為委婉的說法，必須連繫當時的社會情況才能瞭解，例如〈食貨志序〉和〈貨殖傳序〉一再提到管仲的「四民分業定居論」，認為「學以居位曰士」、「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應該「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這話說得含蓄而不够明白，如果我們不瞭解漢代社會長期存在權貴及豪富之家兼併小民的土地，同時在工、商業方面和民眾作不公平的競爭，就不能理解班固的批評矛頭是指向在位者和豪富之家。以上所述各種手法，或多或少都需要連繫全書其他篇章，才比較容易領會。

3. 《漢書》論贊，確有部分較《史記》青勝於藍。以〈匈奴傳贊〉為例，《史·贊》以用人不當作為「建功不深」的唯一原因，不免空疏之失。《漢·贊》不連標點符號，計一二五四字，是班固刻意經營的史論。由於文章很長，不便在此引錄，以下只能略述其中大意：班固歸納以往漢朝對付匈奴的策略，不外和親、征伐二法。根據歷史往事，和親的辦法無效，不但不能阻止匈奴寇盜，反而助長單于的驕氣。征伐的難處，包括動員、後勤補給、糧食運輸、氣候及水土的適

應、輜重多少與軍隊行動的快慢不能兼顧。以現代的觀點來詮釋，對付匈奴的難處，根本的原因在於農業和游牧兩種文化的差異，使得農業民族即使在國力強盛時，也不可能長久佔領、利用草原地區，這正是攻勢國防難以長久持續的原因。在這種客觀條件限制之下，班固提出來的備胡方針是：胡人入侵則加以懲戒性的抗擊，離去則妥善的守備，同時以禮讓善待入貢的國家，這是軍事、外交並用，剛柔相濟的方法。綜上所述，班固的分析，遠較司馬遷詳盡；所提對策，也遠較司馬遷具體而確實。所以連經常偏袒司馬遷的李景星，也在《漢書評議》中比較二者的優劣說：「《史記》原贊未免空疏，班氏擴而不用，另為撰出，其筆力之奇變，不待言矣；末論御外之道，雖聖人復起，亦莫能易。後人謂班氏有勝於馬者，此即其一。」的確是很公道的話。不過就本研究的立場來看，雙方各具匠心的議論更有趣味，它為後人提供了多種「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思維角度，足以拓展我們的思想空間。例如關於經濟活動，司馬遷在〈平準書〉和〈貨殖列傳〉的正文和論贊中主張放任，班固在〈食貨志〉和〈貨殖傳〉的論贊中主張政府介入干預，彼此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雖然歷史的實踐證明，過度的放任，必然造成貧富懸殊的社會問題；過度的干預，必然妨礙經濟的發展。但是由於彼此所述的歷史事實各自反映了一面的真理，所以仍舊值得後人作為寶貴的歷史借鏡看待。又如司馬遷在〈南越列傳贊〉中列舉史實，藉以申明《老子》禍福相倚的道理，反映了當代人對這個問題的關心。班固在〈西南夷兩粵朝鮮傳贊〉中引述管仲所說：「招攜以禮，懷遠以德。」作為與鄰國相交的指導原則。馬、班這些言論雖然都有借題發揮的意思，但所說的也都是至理明言。又如對於劉邦崛起民間，短時間之內即掃平群雄，登上皇帝之位的現象，司馬遷在〈秦楚之際月表序〉中說：「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語氣中充滿驚奇、神秘、意外，視劉邦為「大聖」，視其登基為「天意」，可說「神聖性」十足。

班固在〈異姓諸侯王表序〉中則以為「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完全破除了劉邦的任何「神聖性」，絲毫沒有一點「宣漢」的意味。在上述的例子中，馬、班的議論確實各具匠心，後人其實不必非要將它分個優劣不可。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計畫與本人在台大中國文學研究所所開設之「漢書研究」課程具有密切的關係。自八十九年九月簽訂計畫執行同意書後，即陸續草擬《漢書論贊分篇研究稿》，九十年九月開學後，並利用每週上課之部分時間，與助理及學生討論《漢書》各篇論贊之用意及得失，頗得教研相長之樂趣。其餘成果，已詳第三項，此處自然不必重複。附錄《歷代名家評漢書輯要》，雖然是本研究的副產品，但是對學術界同仁而言，自可提供參考前人說法的莫大便利。

五、參考文獻

由於有關《漢書》的研究文獻數量龐大，本報告不可能仔細羅列，以下只列出其中較為重要的參考專著：

1. 王先謙《漢書補注》，藝文印書館影印長沙王氏校刊本。此書收錄了蕭該以下五十餘家的說法，為顏師古《集注》以後，《漢書》著述中第一大作。
2. 日·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通行本。昭和九年（1934）出版。此書收錄了裴駙、司馬貞、張守節三家注，以及歷代日人及國人對《史記》的注釋一百多種。
3. 郝敬《史漢愚按》，明天啟五年（1625）刻本。
4. 凌稚隆《漢書評林》，凌氏原刻本。
5. 陳仁錫評《前漢書》，明崇禎五年（1632）刻本。

6. 何焯《讀漢書》，見《義門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
7. 齊召南等《前漢書考證》，附於武英殿本《漢書》之後。
8. 杭世駿《漢書蒙拾》，見《杭氏七種》。
9. 牛運震《讀史糾謬》，齊魯書社，1989。
10. 王元啟《漢書正言為》，《惺齋遺書》本。
11.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商務印書館，1959。
12. 趙翼《廿二史劄記》，鼎文書局。
13.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商務印書館，1958。
14. 錢大昭《漢書辨疑》，鼎文書局，1977。
15. 洪亮吉《漢書發伏》，《廣雅叢書》本。
16. 洪頤煊《讀漢書叢錄》，《廣雅叢書》本。
17. 李祖陶《前漢書細讀》，道光十七年（1837）刻本。
18. 沈欽韓《漢書疏證》，浙江書局，光緒廿六年（1900）刊本。
19. 周壽昌《漢書注校補》，鼎文書局，1977。
20. 何若瑤《漢書注考證》，《何宮贊遺書》本。
21. 傅澤鴻《史漢發明》，光緒十六年（1892）刊本。
22. 李慈銘《漢書簡端記》，見王利器纂輯《越縵堂讀書簡端記續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
23. 沈家本《漢書瑣言》，見《沈寄蓀先生遺書》，中國書店，1990。
24. 朱一新《漢書管見》，文海出版社。
25. 李澄宇《讀漢書蠹述》，岳麓書社二十五史三編。
26. 王肇釗等《讀漢書日記》，在《學古堂日記》中，光緒廿二年（1896）刊本。
27.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廣文書局。
28. 黃恩彤《兩漢史斷》，四庫未收書輯刊。
29. 劉咸忻《四史知意》，鼎文書局，1976。
30. 李景星《四史評議》，岳麓書社，1986。
31. 楊樹達《漢書窺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2. 馬敘倫《讀兩漢書記》，商務印書館，1920。
33. 陳直《漢書新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增訂本。
34. 施之勉《漢書補注辨證》，香港新亞研究所，1961。
35. 李威熊《漢書導讀》，文史哲出版社，1975。
36. 徐朔方《史漢論稿》，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
37. 王明通《漢書導論》，康橋出版事業公司，1987。
38. 施丁主編《漢書新注》，三秦出版社，1994。
39. 狩野直喜《漢書補注補》，《東方學報》第9-12冊，1939-1941。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附件）
赴大陸搜集資料及學術交流報告書

計畫名稱：漢書論贊研究—附歷代名家評漢書輯要（I）

計畫編號：NSC89-2411-H-002-057

執行期限：89年8月1日至90年7月31日

前往大陸期間：89年9月16日至11月4日

主持人：李偉泰 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89年9月16日：赴廣州。

9月17日：赴西安，參加「司馬遷與《史記》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日報到，分配住房後，為自由活動之時間。

9月18日：上午開幕式，代表台灣地區學者發言，指出台灣學術界對《史記》的研究風氣相當興盛，研究成果也很可觀。大會報告時，與張大可、可永雲先生共同擔任主持人。下午小組討論時，與韓兆琦、可永雲先生共同擔任第一組召集人。

9月19日：上午大會報告時，以〈試析三代世表及六國年表序的疑義〉為題發表論文。

9月20日：下午閉幕式，受邀為主席團成員，致詞時建議：有鑑於《史記》、《漢書》的關係至為緊密，將來開會時宜將「《史》、《漢》比較」作為主題之一。這個建議獲得了與會學者的熱烈回響。

9月21日、22日：赴韓城，參觀

司馬遷墓、司馬書院、華池、司馬遷先塋等古蹟。22日晚返回西安。

9月23日：由西北大學戴南海教授等友人陪同尋訪漢高祖長陵。陵址頗不易尋，即使居住西安市數十年之學者亦多未曾前來長陵參觀，更不知陵址所在，惟附近老農民始知之。

9月24日：下午飛抵北京，當晚與中國社科院哲學所胡孚琛教授討論道家學術。

9月25日：訪中國社科院歷史所所長陳祖武先生，該所藏有《史》、《漢》珍籍，因託陳先生指導之研究生協助搜集。

9月26日：赴清華大學訪問，由孫明君教授陪同至該校圖書館查閱善本書。

9月27日：上午續往圖書館查閱善本書，中午與清大中文系部分同仁餐敘。

9月28日：上午以「『於無字句處讀書』舉隅」為題，向清

- 大中語系學生演講，中午應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胡顯章教授之宴，同桌者有徐葆耕、李學勤、劉鄂培、孫明君等先生。下午轉赴北大訪問，晚上應中文系主任溫儒敏教授之邀宴，同席者有吳同瑞、嚴家炎、孫玉石、費振剛、張少康等教授。
- 9月29日：由常森先生陪同前往圖書館查閱善本書。
- 9月30日：上午續往圖書館查閱善本書。下午與清大錢遜教授同往首都師範大學，座談「傳統文化之普及問題」，參與者有牟鍾鑒、王殿卿、錢遜、甘葆露、郭齊家、葉瑞昕等教授。
- 10月1日：上午張大可教授來訪，彼此就《史記》研究之若干問題、內地研究《漢書》之動態等交換意見與訊息。下午離開北大，移往崇文門「哈德門飯店」。
- 10月2日：續與胡孚琛教授討論道家學術。
- 10月4日：搭機前往濟南山東大學。下午與林忠軍、李尚信等先生參觀城子崖博物館。
- 10月5日：參觀山東博物館、至各書店購書。
- 10月6日：山大古籍整理研究所杜澤遜教授夫婦來訪，中午餐敘。
- 10月7日：晚間與馮建國、顏炳罡、杜澤遜、程遠芬、林忠軍等教授座談傳統文化之研究與普及問題。
- 10月8日：上午由杜澤遜教授陪同至圖書館查閱善本書。下午與馮建國、王乃璽、宋新國等先生同往嘉祥參觀梁武祠石刻。
- 10月10日：搭機前往上海。
- 10月11日至13日：日間均至上海圖書館閱覽有關《漢書》之善本書。該館古籍部閱覽室閱覽條件頗為理想，所藏直接關係《史》、《漢》之善本書極為豐富，除盡量利用此行查閱之外，亦託館內友人代為影印亟需之資料。
- 10月14日至16日：至杭州、紹興，除遊覽名勝古蹟外，並至浙江圖書館古籍部查閱善本書，該部位於西湖邊，風光怡人，惟照明不足，閱覽之際，甚費眼力。16日晚返抵上海。
- 10月17日：前往復旦大學圖書館查閱善本書。
- 10月18日：搭機前往武漢，訪問武漢大學。晚間該校中國文

化研究院副院長郭齊勇教授設宴款待，同席者有覃啟勳、王啟元、陳文新、金忠烈（韓國學者）等八位教授。

10月19日：上午由中文系王啟元教授陪同前往圖書館查閱善本書，並協助處理影印事宜。晚間文學院陶書記設宴，同席者有劉綱紀、郭齊勇、陳文新、金忠烈等八位教授。晚宴結束後，與人文科學學院、中國文化研究院關心傳統文化之師生，座談傳統文化之研究與普及問題。

10月21日：搭機前往廣州。

10月22日至24日：購書及前往中山大學閱覽善本書，所見該校善本書蟲蛀情況相當嚴重，所需資料必須手抄，難以影印。

11月1日：赴深圳。

11月2日：赴香港。

11月4日：返台。

本學年度適逢休假，故此次大陸之行歷時較長，前後凡五十日。此行之主要目的為：一、參加「司馬遷與《史記》國際學術研討會」。二、訪問若干著名之學術機構，與該機構之成員學術交流。三、前往各藏書豐富之圖書館閱覽並影印資料。期間蒙受各機構舊識及新交之盛情接待與照顧，尤其閱覽國內圖書館之善本圖書，各館每每訂有諸多嚴苛之規定，致使眾多學者視查閱善本圖書為畏途；惟此行在友人照拂下，各館辦事人員均甚為友善，並儘量給予種種方便，令人倍感友情之溫馨可貴。